

# Column

■ 春秋华

## 企业家不能不想清楚人生价值

### ——挣钱与花钱的意义



● 华生

燕京大学校长  
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

中国人原本是最不忌谈钱财的。古往今来,走遍世界,似乎谁都没有像国人这样,把“恭喜发财”挂在嘴上,贴在门上。但是,中国人真正有了相当的资产和财富积累,出现一大批能挣大钱的明星、名流、企业家,乃至涌出了各行各业的财富排行榜,还是近年来的新鲜事。

就市场经济的本源来说,钱即货币真是个好东西。市场经济是人类发明的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制度。为了自己(挣钱)而辛苦劳作作为他人,立足于人以单个肉体存在的物质本性;以相互平等,自愿交换为前提,抓住了人之所以成其为人之精神本质,自由、平等的理想,尽括其中。钱,就是这个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用以衡量自愿交换比例的标尺和尺度。

挣钱,确实是市场经济中个人能力的证明。因为按劳分配,只是计划经济中的理想,实践中是行不来,或者至少要大打折扣的。其原因在于,即使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也有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之分,这就使得人们同样付出的辛苦或劳动大不相同,这又如何分配得来呢?况且自愿交换的核心在于满足别人的需求,要抓住别人、往往是从来未谋面的人的需求偏好,又岂是辛苦劳作就能奏效的?所以,在市场经济中,一国的首富、巨富一般总是企业家,因为只有企业家才不但能准确把握提变的需求,又能不依靠自己、更能组织众人从事最有效的投入和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能挣钱、会挣钱,就和体育竞赛中的优胜一样,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从崇尚权力向崇尚金钱转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标志,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不可跨越的一个阶段。

在市场经济中,就钱可以换取万物而言,它名符其实是万能的。现在当人们说金钱不是万能时,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不万能。人类很多物质特别是精神的需要,市场经济从而金钱无法满足,人们因而还有其他的追求。比如健康、长寿,大多数时候钱买不来。友谊、爱情、快乐、幸福和其他许多对人极重要的精神满足或愉悦,钱也往往不奏效。因为凡人真正珍贵的东西,是不能用钱从而价格衡量的。能用钱买到的,也一定会有不值钱的时候。

人类社会,除了钱的功力有局限之外,钱的来源也常常为人猜疑或诟病。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需要法治环境,但法治是很花钱的事。税收是法治主要来源,而交税却是挣大钱的人讨厌和晦气的事。同时,市场经济的癌症是垄断和外部性,但人们往往很难抵制靠垄断轻松挣大钱的诱惑,又极不情愿支付因为自己挣钱而造成外部环境的代价和损耗。更糟糕的是,钱没有臭味,我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是权钱交易,是巧取豪夺,是血汗劳工,还是贩卖黄货或毒品?富人的第一桶金因此难免让人嫉妒和生疑。此外,就算一切都好,挣钱也离不开运气和天赋。即便是素以久经沙场,沉着果敢著称的企业家们,自然历尽波澜起伏,靠自己的创业、辛勤和毅力终于成功,所谓偶然当中有必然,但谁又能否认多少次转折关头,是天无绝人之路,靠天降甘露,结果遇凶呈祥,化险为夷呢?更不用提某些偶然的创新和消费模式,如电视和大众媒体,使得一些人凭借特殊禀赋一下子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价值。想到这一点,会挣钱又真是没有很大的骄傲,不过是一些人恰好具备了市场化生存的“手艺”或禀赋。所以古人就有“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之说,富人只不过是正好沾了赚钱这一行当而已。

不过,金钱的力量固然有限,但金钱的贪念和驱使欲却可以是无限的。世界上固然总是有一些明星或富人挥金如土,穷奢极欲,让一干平民叹息。即使被称为精英的企业家们其实也颇难自拔。马克思生动地描绘了资本如何像魔鬼,使拥有它的人心智反为其所控,利欲熏心、恶性膨胀,自己欲罢不能。好莱坞电影中的商业狂人往往想垄断全世界的资源,驱天下人为奴,以满足自己的贪欲,恐怕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金钱确实是一种权力,拥有它,你就拥有了支配人们向往的许许多多东西的权利。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权力不能继承,而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但支配金钱的权力是可以积累,可以继承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受约束或不需对别人负责的权利。这样看来,挣钱固然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能力,花钱才能真正体现一个人的价值。

就花钱而言,中国自古也有两种视角。一种是对守财奴的嘲讽。我们今天知道这些人其实是在辛苦地储蓄,是现代银行客户的最佳发展对象,于社会有益无害。另一类是文人墨客“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放,很受人景仰,可惜那只是文人的张狂,在经常饿着遍野的时代,并没有现实基础。进入工业化消费社会,能挣会花是时尚,消费不足成了宏观经济的麻烦,真让人有此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挣钱固然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能力,而花钱才真正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认为有钱人花钱的最大价值,就是让他们捐赠、做慈善,这恐怕存在很大误导。如果那些真正成功的一流企业家,真把财产都捐了出去,中国是多了一大批慈善家,但却消灭了大批一流的企业家,这不仅会损害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乃至中国人的福祉,最终也将大大减少了未来的大慈善家。李嘉诚把他的财富分成三份,让基金会成为他的第三个儿子,这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化价值观的体现,显然也是可以给相对比较年轻的中国内地企业家一个早来的参考和启示。

彼一时的感慨。更有甚者,今天即使是富人的奢侈品消费,也是就业和 GDP 的创造和再分配。既然如此,那现代人的花钱,又能体现出什么额外的价值呢?

现在一般认为,有钱人花钱的最大价值,就是让他们捐赠、做慈善。这恐怕存在很大的误导。以企业家为例,现在真正的成功者,应当说大都是一流的企业家,如果他们真把财产都捐了出去,中国是多了一大批慈善家,但却消灭了大批一流的企业家,这不仅会损害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乃至中国人的福祉,最终也将大大减少了未来的大慈善家。因此,即使捐赠是实现个人价值的一种途径,但恐怕也不是唯一或主要的途径。

有钱人的花钱,做企业家或投资者,恐怕是最生产性的花法。所谓亿万富翁的财富是社会的,大约意思也就在此。俄罗斯的新贵中有人花几亿为女儿办婚事,应当说是对人类有限资源的挥霍。中国的企业家和其他有财富的人们喜欢投资置业,肯定是一种美德。储蓄和投资,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车轮,它使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从中受益。资本的社会化,使得更多富裕或不那么富裕的人迈入了投资者的行列。这些都为社会更加合理与公平的再分配提供了可能。

当然,企业家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他们可以在投资的各种可能性或诱惑中,利用自己拥有或支配金钱的权力,促进一些更有社会价值、更加符合人道和更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项目和事业。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引导自然、健康、高雅的生活方式和情趣,推动社会道德的提升和社会风气的演变。

当然,任何企业家或者投资者,都有一个最终如何花费或处理属于自己的财产问题。本来,他们的花费方式,包括自己及其家庭有限的消费是他们个人的偏好和隐私,但也确实透露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取向。当代世界的或华人社会的巨富,以其花钱方式显示他们的价值观。非常有趣的是,最讲效率的企业家们在处理财富问题时,往往采取公平的尺度。也许这样做他们自己也能得到最大的享受和快乐。因为当你拥有根本消费不完的巨大财富时,实际上往往更多考虑的是这身外之物或身后之物的公平分配。你可以把你财产中的任何一块给任何人,但一般你并不愿意让不相干的人得到他并不应该获得的一份。就如李嘉诚捐赠回馈社会亿万,但对两个在困境中奋斗并向他求助的年轻人只寄 50 磅的一顿饭费一样。所以,有时媒体曝光特定的富人或企业家,让他们面对一个困境中的家庭,以此作道德选择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既干预了公民的个人偏好和选择权,也不公平地把一个得到媒体关注的特定困难个人或家庭,人为地加在其它千千万万遭遇同样困境的人们之前。

同样的公平原则,可以有个人角度,回报那些与我们亲近,对我们有过帮助的人们,这合乎人性,也符合人类道德;也可以有社会角度,就是让自己的幸运惠及更多并非不努力但不太幸运的人们。企业家或富人花钱的主要抉择恐怕是在他接近自己辛勤操劳一生的最后。一些美国富豪认为,带着巨额财富死亡是一种耻辱。另一些人

说,把巨额金钱留给子女不符合美国依靠个人奋斗的价值观念,因而是道德的。所以这些人选择了晚年将财产捐赠给社会,通常是民间设立的慈善基金会。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家相继着手在身后捐赠财产,不能不说是传统资本家观念的革命性颠覆。对于东方文化来讲,企业家子女往往较早地介入了公司经营,家族财产中也有理属于子女奋斗的一份。李嘉诚就把他的财富分成三份,让基金会成为他的第三个儿子。这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东方文化价值观的体现,显然也是可以给相对比较年轻的中国内地企业家一个早来的参考和启示。

有个企业家感叹说,如果像比尔·盖茨或巴菲特那样,把一生积累的财产全捐了,那即使把企业做到世界第一还有什么意义?这显然混淆了挣钱与花钱的不同意义与价值。因为试想,当一个人快要走完生命历程时,守着一大堆身外之物的财富,看到想到多少人为之勾心斗角,还得不到心灵的安宁,又有什么意义?如果企业家在其奋斗过程中就想清楚了这个人人生价值问题,他的拼搏和生活就会更潇洒,更超脱,更有价值和意义。

■ 左眼右眼

## 三十年风云激荡 三代企业家命运变奏



● 陈东升

泰康人寿公司董事长 经济学博士

思考当今中国企业家命运的前提,是鸦片战争迄今的中国国运。

我们熟悉的哥伦布航海活动,发生在郑和下西洋之后的 40 年,之后最讲效率的企业家们在处理财富问题时,往往采取公平的尺度。也许这样做他们自己也能得到最大的享受和快乐。因为当你拥有根本消费不完的巨大财富时,实际上往往更多考虑的是这身外之物或身后之物的公平分配。你可以把你财产中的任何一块给任何人,但一般你并不愿意让不相干的人得到他并不应该获得的一份。就如李嘉诚捐赠回馈社会亿万,但对两个在困境中奋斗并向他求助的年轻人只寄 50 磅的一顿饭费一样。所以,有时媒体曝光特定的富人或企业家,让他们面对一个困境中的家庭,以此作道德选择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既干预了公民的个人偏好和选择权,也不公平地把一个得到媒体关注的特定困难个人或家庭,人为地加在其它千千万万遭遇同样困境的人们之前。

新中国 58 年风风雨雨,分三个阶段二个时期。第一阶段是从初步农业国迈向初步工业国 (1949-1979);在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情况下,初步建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个阶段是从初步工业国向新兴工业国转变 (1978-2004);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全面建设和形成市场经济体系;从 2004 年

起的第三个阶段是从新兴工业国向中等发达国家的转变,完成建设发达工业国的阶段。

1978 年后的 30 年,中国的核心是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社会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改革开放 30 年最伟大的成果是两个,一个是宏观方面以价格改革为核心,建立和建设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第二个核心是微观层面的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即在所说的产权改革,结果是建设一个现代企业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以市场配置资源的混合所有制。过去是国有资本,欧美社会是私有资本,所以,这个混合所有制实际上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发明。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看清中国三代企业家的成长和命运的轨迹。所有制改革和产权改革的结果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核心是一个企业家群体的形成、成长、发育和崛起。期间,中国企业家们的成长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三个不同时期企业家的核心精神,三次变革和两次伟大的制度创新形成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和体现企业家



●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 持久增长力量来自持续制度创新

■ 知无不言

市场、机会与价值,只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相对于空间的多元性,时间只能是一元的。所以,亚当对夏娃说:“亲爱的,我们生活在过渡时代”。正因没有哪个时代不是过渡的,转型与变化才是永恒的,也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人们可以用空间换取时间,也可以用时间换取空间,但那也只是就单向性的未来可能而言的,更是一种增量变化的涵义。

正因如此,对经济分析来讲,存量固然不可忽视,但作为增量变动的“边际”更加重要,尤其是在时间序列上。

自门格尔、杰文斯与瓦尔拉斯三位重量级人物在 19 世纪发起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后,经济学家开始以微积分为主的数学工具精确分析增量变化。但是,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更多地集中于微观领域。其实,就宏观经济与社会变迁看,边际概念同样是最重要的。人们是否忽视,是就两个方向而言的:过去与未来。越是对更久远的过去有着正确的认识,就越能够预期更长远的未来,从而,也就越是更有效地把握现在,做出更理性的行为选择。

观察人类经济生活的增量变化,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起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了。呈明显阶段性发展的工业化,每次的阶段性转变都是由边际意义上的突破引发的。如果将 18 世纪以英国新型棉纺织技术发明和创新为起始力量,以水力和铁为核心投入,以运河与公路为基础的棉花、铁和水力时代为工业化的第一阶段,那么,自 19 世纪 20 年代起以煤和铁为核心投入的铁路、蒸汽动力和机械化时代则视为第二阶段,19 世纪 80 年代起以电力技术被广泛运用并以钢为核心投入的钢铁、重工业和电气化时代则是第三阶段,20 世纪尤其是“大萧条”后以石油为核心投入的石油、汽车、动力化及大规模生产时代是第四阶段,20 世纪下半叶以万能芯片为核心投入品、计算机广泛运用的信息通讯技术时代应该是迄今尚未结束的第五个阶段。这种工业化五个阶段的界定,是克里斯·弗里曼和弗朗西斯·卢森在《光明似箭——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一书中提出的,在我看来,是更符合事实而又恰合理的。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在上述工业化五个阶段的演化转变历程中,全球经济的领先、赶超与落后的相对变动。这最典型地体现在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工业化转变中,从中也能体味到对当前中国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有意义的启发。

英国在工业化的第一、二阶段无可争议地占有领先地位。即使在向以电力与钢铁技术为标志的第三阶段转化时,英国在相对于新兴工业的诸如棉纺、煤、生铁、水力等传统工业领域仍拥有成熟的技术体系,以及当时最高的效率。这些都是美德当年难以比拟的。但是,无论是美国还是德国,都没有在作为“存量”的传统工业领域下最大工夫来同英国竞争,相反,他们集中力量在作为“增量”的电力与钢铁等新兴工业技术和生产上持续投资,迅速培育起最强的竞争力,终于创造出了超过英

国的“边际增长”,先后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将英国抛在了身后。

这说明,无论是个体,还是作为国家的经济体,相对于无限的一元时间维度,都是“生活在过渡时代”。无论某种状态的领先抑或落后态势持续多长时间,都会最终得以变换。经济与社会的赶超是完全可能的,但不是自动的。

什么对改变落后甚至超越领先者是最重要的?根据众多经济家的研究,答案可以高度概括为一点:是社会政治选择及更广泛制度的惰性,使英国落后了;也正是社会政治选择及更广泛制度的创新,才使美国和德国超越了英国。教育制度和金融制度的适应性,可能是其中最突出的体现。

在 19 世纪 70 至 90 年代,美、德就建立起了为新兴工业提供符合要求的工程技术与职业管理人才的教育体系,不仅使普通的中低技能岗位人员得到系统教育与培训,而且其先进的高等教育体系,更为电气、钢铁、化学工业等新兴领域提供了大量专业工程师、化学家及管理者。针对电气化与重工业需要巨额投资的情形,美、德金融业迅速调整业务结构,建立起了新型的金融制度,促进并保障金融体系能够最大限度地更多的国民产出用于投资。在社会政治选择上,尤其是美国,建立起了广泛的民主机制,以确保竞争、经济技术创新和工业投资的可持续性。而当时的英国,无论是在教育制度,还是金融制度,却仍然沉迷于满足传统工业需求的惰性状态。特别是其金融制度,在一味沉迷于伦敦金融城巨大影响力和全球金融中心的氛围中,停滞不前,致使当时主导英国经济政策的是“金融资本”与“海外证券投资”,而非制造业部门。由此可见,持续不断的制度改革与创新,才是创造更高边际增长的关键所在。

在当前的中国,上述五个阶段的工业化都存在着。大规模且持续增长的煤、电力、钢铁、石油都是核心投入品,公路、铁路以及汽车、火车、轮船等运力还不出现瓶颈。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计算机、移动电话和网络市场。无可否认,如何拉近同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一样是中国发展的目标。当长期落后的中国终于在有了机会大规模推进工业化进展时,却面临着传统工业欠账太多而需要全面铺开,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标志的新兴工业日新月异。但就目标与面临的形势而言,目前中国与 19 世纪落后于英国的美、德两国没有本质区别。有所区别的,恐怕在于我们能否认识到在“边际”意义上,围绕激励新兴工业技术创新,在社会政治选择、更广泛的制度改革和建设上能够保持持续性。

同样突出的还有教育与金融制度。能否建立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既能够为新兴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又能够对大量从乡村农业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进行系统教育与培训,满足工业化推进所需要的中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应该是教育制度不断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传统工业的跟进与新兴工业的突破,都意味着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中国需要持续的巨额投资,高储蓄高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突出特征。为此,中国的金融制度必须适应这一要求,无论是金融结构的建设,还是金融业务的调整,抑或金融监管,都应促进储蓄有效地转为投资,为主要依靠国内资本的投资可持续性增长服务。

价值的阳光创富制度。

第一代企业家厚重、悲情、充满沧桑。

这一代企业家出现在上世纪 80 年代早期,企业产权不清晰。后来的发展大致分为几种模式:一是万科模式。万科是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国有企业,王石一直是职业经理人;二是联想模式。联想的产权很清晰——国有,当时中国科学院出资 20 万,但建立分享制度,给与了管理层 35% 的股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创业企业家的价值。第三种模式是改制转型。万向集团算是典型,从集体所有制向现在的企业制度成功转型。第四种是海尔模式。海尔创立时是集体企业,产权不清晰,现在依然不清晰。

第二代(所谓“92 派”)企业家具有责任感、使命、执着的时代特色。

所谓“92 派”是指 1992 年下海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社会主流精英。他们代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企业,企业产权清晰,但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价值没有得到很好体现,部分企业家在财富积累、股权变化和交易中存在“瑕疵”,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可以用创始人、期权等现代企业家制度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

第三代企业家开放、阳光、新锐。他们代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企业,企业产权清晰,但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价值没有得到很好体现,部分企业家在财富积累、股权变化和交易中存在“瑕疵”,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可以用创始人、期权等现代企业家制度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

第三代企业家开放、阳光、新锐。他们代表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企业,企业产权清晰,但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价值没有得到很好体现,部分企业家在财富积累、股权变化和交易中存在“瑕疵”,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可以用创始人、期权等现代企业家制度为自己争取合法权益。

第三代企业家的不同经历,实际上是

中国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家价值被社会认同的过程,这刚好是一个从制度创新到制度模式化最终确立的过程,也是从“原罪”到“阳光创富”的历史演进。如果按照现在的创始人制度和期权制度回溯历史,则第一代和第二代企业家都不存在瑕疵或者原罪,所谓原罪是制度的缺陷形成的伪命题。

企业家价值的制度化认同是和社会和国家创新进步的源泉。中国进入 WTO 后,三代企业家融合,进入了多元化企业家成长时期。企业家和企业家的素质迅速提升,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大大快于跨国企业本土化的过程。所谓国际化,就是按不按国际规范,有没有严密的企业管理结构,机制是不是透明,在这一点上,据我看,三代企业家都做得非常好。

一个企业的成长历程,三年决定生死,五年打下基础,八年站稳脚跟,十年小有品牌,20 年才能成就参天大树。海尔、联想、万科、平安、华为、招商银行等企业正在通向成为参天大树的路上。

回想三代企业家,第一拨已逐步离开这个舞台,第二拨还在积累,第三拨有很多人从创业家快快地转向投资人。企业界有句话:“企业家的伟大是熬出来的”,确实,成为伟大的企业家,得甘于寂寞,得熬上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崛起必然伴随一个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中国企业家群体必须要进入国际企业家的群体。我深信,中国涌现大企业的时代必即将到来。